

P.L.A.

中·共·研·究

● 作者/Jagannath Panda and Wooyeal Paik ● 譯者/李永悌 ● 審者/黃坤銘

烏俄戰爭後的俄印 「中」三方機制

The Russia-India-China Trilateral After
Ukraine: Will Beijing Take the Lead?

取材/2022年9月9日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(*China Brief*, September 9/2022)

二十一世紀初期，俄印「中」爲了促進經貿發展而成立三方機制，即便目前機制未臻完善，但仍不失爲三方交流溝通的權宜之計。

(Source: Shutterstock)



前言

2022年7月下旬，中共國務委員暨外交部長王毅在上海合作組織(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, SCO)外交部長會議中，敦請印度、哈薩克(Kazakhstan)、吉爾吉斯(Kyrgyzstan)、巴基斯坦、俄羅斯、塔吉克(Tajikistan)及烏茲別克(Uzbekistan)等會員國與會代表，共同支持和衷共濟、守望相助的「上海精神」(中共國務院，2022年7月29日)。接著，王毅提出了共創上海合作組織美好未來的「五點建議」(環球電視網，2022年7月30日)。其中，王毅呼應2022年6月習近平於金磚五國(BRICS，分別為巴西[Brazil]、俄羅斯[Russia]、印度[India]、中共[China]、南非[South Africa]等國)高峰會所提四點建議——並藉由富有詩意的火、風、水寓言——走上相互支持、合作共贏的「正道」，展望一個更加全面、包容的高層次合作未來(求是，2022年6月24日)。金磚五國已備有「金磚+」機制，正考慮廣納「志同道合」的合作夥伴。

中共聲稱，已透過上海合作組織、金磚五國高峰會與其他多邊組織，推動兼容並蓄之國際關係模式，並在前述組織中扮演要角。此說法與北京嚴詞抨擊西方國家——特別是美國——以既有規範(亦即自由民主「普世價值」)單方劍指或孤立某些國家的做法吻合。北京不斷宣稱，美國主導的正式聯盟已將世界政治推向零和競爭，因此，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，推動自己的多邊與雙邊戰略合作網路，並以其作為反制美國聯盟的「正和措施」(Positive-Sum Correctives)(中國簡報，2022年7月15日)。2022年6月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(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, NATO，以下簡稱北約)舉行馬德里峰會(Madrid Summit)，會中首度將中共認定為「系統性挑戰」(Systemic Challenge)，並邀請印太地區國家擔任觀察員。中共對此嚴正抨擊，而近期類似反美論述也變得更加頻繁。因此，中共對北約將觸角伸入亞洲，或以類似模式塑造「亞洲北約」(Asian NATO)的憂慮更形加劇。北京以一系列長篇激昂措詞回擊北約，並將西方安全集團稱為「流氓」、「戰爭機器」與「屠夫」(環球時報，2022年3月16日)。惟與此同時，習近平、王毅與其他領導人的用語皆訴諸中共



2019年6月28日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、俄羅斯總統蒲亭及印度總理莫迪於日本大阪G20峰會期間會面。(Source: 中國日報)

「中國特色」，同時諷刺地在多國論壇解決多樣性問題。關鍵問題是：與西方鮮少互動的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，對於中共成為國際領導者會支持到何種程度？

在此背景下，中共近來不斷拉攏印度，共同對抗排他性小團體、零和遊戲及美國「新冷

戰」思想之舉，變得更值得關注(環球電視網，2021年11月26日)。在烏俄戰爭初期，「中」印對俄羅斯的舉措均保持緘默，而出人意料的是，「中」印兩國都與莫斯科維持友好關係。沒有人料到，雙方這種「默契」卻誘使「中」印攜手合作。上述情況對俄印「中」(Russia, India,

and China, RIC)三方機制而言有何意義？在上海合作組織及金磚五國等中共主導的多邊組織內，此種合作將陷入困境或持續推展？

全球格局丕變：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的難題

長久以來，俄印「中」三方

機制一直被吹捧為歐亞大陸最具影響力的高層(外長級)三邊關係。為了紀念1990年代末期，俄羅斯前總理普瑞馬可夫提出前述機制反制美國，此機制因此而被稱為「普瑞馬可夫戰略三角」(Primakov's Strategic Triangle)。不過，該集團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成立時(最初，「中」印因其帶有反西方意涵而猶豫不決)，打出的口號是合作、貿易、經濟擴張與穩定(中國日報，2005年6月2日；Pravda，2002年12月2日)。

多年來，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一直被視為非屬西方的關鍵對話與合作平臺，設立目的為塑造全新多極秩序(Valdai Club，2012年5月14日；中國日報，2019年6月29日)。儘管此架構持續引發全球關注，卻因一系列問題而陷入困境，未能發揮全面功能。這些問題包括：政治制度差異、「中」俄目標日益相似及印俄經貿往來有限。此外，2012年習近平主政後，印「中」敵意日益升高，導致近期雙方於爭議邊界發生兩次重大對峙，而兩國海上競爭也逐漸加劇。或許，問題主因是印度支持美國主導的印太架構，但俄「中」都對此嗤之以鼻。當然，這些因素限制三方互動，也進一步限制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的發展。

甚至連中共官方媒體都以加強合作、共同面對問題等制式說辭，來描述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，並稱2018及2019年領袖高峰會為「非正式」會晤；環球電視網「2018年記者回顧」專題報導中，亦未提及中斷12年後舉行的2018年俄印「中」高峰會(環球電視網，2018年)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宗義在接受《環球時報》採訪中表示，中共低調回應，可能是考量美印戰略夥伴

關係、「印太盟友」(Indo-Pacific Allies)的友好互動，以及2017年洞朗(Doklam)對峙後的緊張局勢(環球時報，2019年6月26日)。

儘管如此，2020年加萬谷(Galwan)邊境衝突與危機後，中共媒體一致認為，三方機制改善印度與「中」俄等「大國」間關係，進而提升國際「地位」，並在安撫印度同時，不斷以終止前述三方機制作為威脅(環球時報，2020年8月27日)。2020年6月，「中」印衝突達到顛峰，三國外長舉行線上會議。接著，同年9月，「中」印雙方應俄羅斯要求在莫斯科進行會談，過程中，俄羅斯保持中立態度，毫不偏袒，並在某種程度上擔任「多邊平衡者」(南華早報，2022年1月9日)。儘管這些討論有助於緩和緊張局勢，但會後並未簽署具體行動計畫(印度外交部，2020年9月10日；中共外交部，2020年6月23日；ISPI，2022年3月26日)。有趣的是，儘管俄方拒絕進一步扮演中間人，但《環球時報》前總編輯胡錫進辯稱，俄羅斯持續對印度出售武器之舉措並非背叛中共，同時聲稱：「事實上，俄羅斯在這次『中』印邊界衝突中扮演居中調停的角色。」(Business Standard，2020年6月23日；環球時報，2020年9月15日)。

對中共而言，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是協同俄羅斯，合作推展歐亞戰略的工具，尤其是這兩個威權大國皆批評美日印澳「四方安全對話」(Quad)為菁英主義集團，並同聲反對「自由開放印太」構想(The Strategist，2021年7月1日；The Hindu，2021年11月26日)。這個機制讓「中」俄在政策上有所交集，但也同樣成為俄印夥伴關係的主要媒介(The Interpreter，2021年3月3日)。

中共試圖在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中，展現其重要性更甚印度。此舉在當前的氛圍下有兩項目的：首先，如此一來，中共在論及「中」印邊境實際控制線(Line of Actual Control, LAC)時較能向印度施壓。重要的是，中共透過強化「中」俄互動，試圖制止或限制莫斯科向德里出售武器，進而限制印度防衛能力，尤其是在實際控制線周邊地區。其次，如此可讓中共利用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作為跳板，在諸如上海合作組織、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(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, AIIB，以下簡稱亞投行)及金磚五國等論壇發揮更大影響力，藉以推展其中亞戰略，限縮印度戰略空間。為達此目的，中共將自己形塑為俄羅斯可靠的關鍵夥伴，並成為俄羅斯對抗美國制裁時的關鍵支柱(新華社，2022年6月17日；Business Standard，2022年6月21日)。

中共謹記此目標，巧妙維持戰略平衡。例如，由於西方各國制裁，2002年3月，亞投行暫停與莫斯科及白俄羅斯進行金融活動，並以前述作為對成員國產生外溢效應(例如對企業產生經濟與金融風險)為由，在未嚴厲譴責俄羅斯的情況下，擴大對烏俄戰爭受害國進行金融援助(亞投行，2022年3月3日)。同時，提升人民幣之國際清算(International Settlement)金額。中共金融專家也抨擊，西方對亞投行的說法純屬「抹黑」，強調該銀行頗具聲譽，各項運作均遵循「市場機制」，目的不是為了「懲罰」俄羅斯，而是要降低風險帶來的影響(環球時報，2022年3月4日)。在此背景下，中共制衡戰略——至少在某種程度上——恐侷限「中」俄關係，並影響俄印「中」戰略

三角間的互動。

中共全新計畫

即便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下一場領袖高峰會日期未定，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(Sergei Lavrov)重申，莫斯科認為雙邊對話對於建立「中」印互信至關重要(Tribune，2022年1月15日)。儘管多年來，彼此共享的不自由價值觀，一直是「中」俄雙方關係發展的基石，但隨著雙方逐漸捲入對美激烈戰略競爭，「中」俄偽聯盟已在近期逐漸萌芽。蒲亭與習近平等強人間的「權宜之誼」，在敏感雙邊問題上發展出微妙的外交手段。例如，莫斯科在華為5G技術、香港問題及新冠疫情等議題上全力聲援中共；中共雖然對烏俄戰爭採取看似中立的立場，卻一再強調俄羅斯的「合理關切」、聯合反對北約、拒絕「單邊制裁」，以及將莫斯科納入其所主導的多邊論壇(中國日報，2020年7月3日；莫斯科時報[Moscow Times]，2019年6月6日；環球電視網，2022年2月23日)。

北京與莫斯科並非對所有國際問題都持有一致看法。例如，中共並未認定克里米亞(Crimea)為俄羅斯合法領土，而莫斯科對北京南海主權主張則保持中立(環球時報，2014年3月22日；塔斯社[TASS]，2016年6月10日)。因此，在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下，中共試圖確保前述歧見不會影響「中」俄夥伴關係。由於俄羅斯一貫主張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是維持「中」印關係穩定的機制，北京也淡化「中」印緊張關係，「低調」帶過雙方歧見，不斷強調「共同利益」(中國日報，2022年6月24日)。

最後，中共試圖運用經濟與軍事力量遏止印度

崛起，但亦審慎評估，確保此舉與重塑區域暨全球安全架構理念不相違背(Stimson, 2022年5月4日)。例如，「中」印歷經16次軍長級會談後達成「四點共識」，近期會談呈現出友好氛圍，雙方在上海合作組織及金磚五國論壇上也表現出類似互動(人民日報，2022年7月29

日)。因此，透過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取得影響力後，中共不僅希望透過其他平臺強化「中」俄關係，也希望向新興與發展中國家展現自己與美國的差異，身為負責任大國，在面對印度這種傳統戰略競爭對手時，也能有效合作。中共的終極野心，就是在全世界事務中將美國邊緣化

或妖魔化，並使整個西方相形見绌。

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將式微或回歸原點？

與「中」印兩國相比，在入侵烏克蘭前，蒲亭似乎在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上投注較多心力。對印度而言，運用此機制來



2020年9月4日，中共、俄羅斯及印度三國國防部長(依序由左至右)在莫斯科上海合作組織國防部長聯合會議(Joint Meeting of Defense Ministers)中會晤。(Source: 達志/AP)

強化與中亞地區互動、駕馭中共，以及藉此與不受國際社會歡迎的國家進行往來，成效都相當有限。

對中共而言，此三方機制的吸引力亦相當有限，特別是印度不太可能示弱。惟「中」印穩定雙邊關係——中共實現金磚五國與上海合作組織宏願的必要條件——對三方皆有所助益。

然而，烏克蘭危機讓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重新受到關注。目中無人——與美國進行貿易戰、雙方軍事競爭日益激烈——的中共，加上飽受制裁的俄羅斯，兩者皆受西方國家集體孤立，正試圖擴大其專制勢力範圍。印度是新興大國，也是與西方溝通的橋樑，雖然具有戰略價值但卻堅守平衡外交立場，因此對前述野心而言至關重要。

這樣一來，是否代表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將捲土重來，這點仍令人存疑。根據報導，2022年初，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沙卡洛娃(Maria Zakharova)已將籌辦下次三方領袖高峰會的責任交予中共(Wion, 2022年2月28日)。奇怪的是，中共政府與媒體在強調「中」印合作「復甦之勢」時，卻閉口不談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(中國日報, 2022年7月15日)。

儘管如此，單就過往成就而言，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未來(即便重拾最初意圖)可能不再有迫切必要。彼此間的互補關係並非獨一無二，金磚五國與上海合作組織等平臺也具有類似功能，甚至還更能發揮效果。北京當然也了然於心，並試圖與忌憚西方及厭倦西方的國家建立聯繫與強化前述平臺，而不將資源虛耗在過時的三方機制。不過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不太可能完全廢除，而且將一

如往常舉行定期外長簡報，亦可能間或舉行領袖級高峰會。

因此，儘管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未臻完備亦有其限制，但「中」印仍可能會支持此架構。雙方都希望形塑多極化世界秩序，而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即為彼此的協商平臺。儘管中共有意阻止印度與美國(及整個西方集團)深化合作，而印度也極欲確保俄「中」夥伴關係不會提升到更高層次，但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是一個論壇，雙方可藉此保持互動，試圖實現目標。重要的是，印度無論是要強化俄印關係，或是要試圖與中共平起平坐，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雖然沒有實際成果，但貿然退出並非戰略上的明智之舉。印度參與東方演習(Vostok Exercise)也是出於此種戰略考量。此外，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讓「中」印雙方得以利用與俄羅斯的共同友好關係處理邊界爭議。在俄羅斯與西方關係降到冰點時，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保留與最親密的兩個夥伴往來的機會，確保印度不會轉而加入親美陣營。因此，俄印「中」三方機制仍將繼續存在，不過重要性仍有待觀察。

作者簡介

Jagannath Panda為瑞典安全與發展政策研究院(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, ISDP)斯德哥爾摩南亞與印度太平洋事務中心(Stockholm Centre for South Asian and Indo-Pacific Affairs)主任，亦為荷蘭海牙戰略研究中心(The Hague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)資深研究員。

Wooyeal Paik(白宇烈)為韓國首爾延世(Yonsei)大學政治學副教授。

Reprint from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with permission.